

# 第十一章 國家與戰爭：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邂逅

汪宏倫

## 第一節 「意外的邂逅」：為什麼是歷史社會學？

1970 年代末期以來，社會學與國際關係兩個原本無甚交流的領域開始相互產生影響。首先是歷史社會學開始嘗試將國際關係——尤其是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納入研究範疇與理論體系；而到了 1990 年代以降，隨著歷史社會學對國家研究的增加，國際關係學者也對歷史社會學的著作產生興趣，認為歷史社會學的研究足以彌補國際關係理論的不足。例如任教於國際政治學科發祥地 Aberystwyth 的 Stephen Hobden 在 1998 年出版了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一書，有系統地評介了 Theda Skocpol、Charles Tilly、Michael Mann、Immanuel Wallerstein 等社會學者的作品（Hobden, 1998）；兩年後，John M. Hobson 在其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書中，將「韋伯學派歷史社會學」（Weberian historical sociology）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斯主義、建構主義等並列，視其為國際關係理論的一支（Hobson, 2000）。到了 2002 年，Hobden 與 Hobson 兩人更合編了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書，許多活躍的知名學者如 Andrew Linklater、Barry Buzan、Richard Little、Steve Smith 及 Fred Halliday 等人均在書中為文大談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關連與影響，儼然歷史社會學已經成為國際關係學科中一個重要的流派（Hobden and Hobson, 2002）。為什麼這兩個看似不太相干的學科領域會彼此產生交集？這個交集有何意義、又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由於不同的學科領域原來各有各的知識旨趣與研究議程（research agenda），我們也必須分別從社會學與國際關係各自的發展脈絡才能理解這場邂逅的產生與意義。

首先，從知識的發展脈絡來看，社會學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方法論的民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傾向，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民族國家等同於社會，以民族國家的疆界來劃分析的單位，因此處於民族國家疆

界外的「國際」因素，大部分的社會學並不處理，即使觸及，至多也只是將之視為「外生變數」(exogenous variable)來看待。<sup>1</sup>這種傾向在二次大戰後的1950年代與1960年代尤其明顯，主流社會學的研究典範被實證主義、結構功能論與現代化理論所主導，即使其中不乏「跨國」或「國際」的比較研究，但在這些比較研究中，民族國家仍舊是預設的社會單位而未受到質疑。在此背景下，歷史社會學對國際因素的關注，毋寧顯得有幾分特殊。<sup>2</sup>作為社會學下面的一個分支領域，歷史社會學關心的是宏觀(macro)、大規模的歷史變遷，並嘗試提供結構性的因果解釋。根據Skocpol的說法，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共享幾個特徵：首先，他們關切具體時空脈絡中的社會結構或過程；其次，他們強調歷時的過程，在解釋結果時重視時間序列；第三，他們注意到有意義的行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關聯，以解釋個人生命或社會變遷中的意圖與非意圖後果；最後，他們強調某種特定社會結構或變遷模式的特殊性與變異性(Skocpol, 1984: 1)。從這幾個判準來看，一般所稱的古典三大家——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其實都算得上「第一代」的歷史社會學者，而「第二代」(或稱「第二波」)的歷史社會學者則出現在1960年代中後期以降，主要是針對1950與1960年代佔據主流地位的結構功能論與現代化理論的反思與批判，包括Reinhard Bendix(1964)、Perry Anderson(1974)、Barrington Moore(1967)、Immanuel Wallerstein(1974)、Charles Tilly(1975, 1978)、

---

<sup>1</sup> 有關「方法論的民族主義」，可參見Smith(1983)、Giddens(1985)。Smith抱怨方法論的民族主義，使得社會學對民族主義問題渾然不覺甚至有內在盲點，而Giddens則是明白指出，社會學以民族國家為預設的社會單位，使得社會學自外於國際關係的分析，無法處理超出國家疆界以外的問題。

<sup>2</sup> 在此有必要對「歷史社會學」做一點正名討論。此處的「歷史社會學」特別指由美國社會學所建構出來的一個次領域，其特性將在下文詳述。在歐洲學界，社會學本身即隱含歷史的解釋，因此並不特別把歷史社會學當成一個次領域。美國學界(包含受美國影響至深的台灣學界)傾向於把歷史社會學理解為「從事歷史研究的社會學」，背後隱含了一種預設，認為社會學是研究現在，而歷史社會學則是研究過去(歷史)，這其實是一種對歷史社會學的狹隘理解，也反映了美國主流學界的偏見。事實上，「歷史社會學」作為一個領域，一開始的時候其實受到主流社會學的排斥；但饒富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因為偏見而產生的名稱，卻成了這個次領域的自我認同的來源。有關歷史社會學在美國主流學界的位置及其如何被評價的問題，可參見Adams et al(2005)。

Theda Skocpol (1979) 等人都被視為其中代表性人物。<sup>3</sup>

另一方面，國際關係的發展軌跡與知識旨趣，與社會學雖有不同，但也有若干相似之處。作為一種規範知識，國際關係與政治學同樣古老，「戰爭」與「和平」可說是國際關係恆久的主題；但作為一門建制化的學科，國際關係甚至比社會學還要年輕。<sup>4</sup>國際關係理論著重探討主權國家之間的衝突與合作，原本應帶有強烈的規範意圖與實用色彩；然而，受到 20 世紀以來實證主義與行為科學的影響，「如何科學地理解國際體系的運作、並解釋其成員之間的互動與關係」反成了主流。從 1948 年摩根索的《國際政治學》(*Politics among Nations*, Morgenthau, 2006 [1948]) 到 1979 年 Kenneth Waltz 出版《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ltz, 1979) 的三十多年間，國際關係一直以這兩位作者為代表的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為主流。根據 Hobson 的說法，國際關係學者對歷史社會學開始感到興趣，主要乃是因為國際關係理論——尤其是佔據了主流位置的新現實主義——本身面臨的困境與危機。Hobson 認為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有四個盲點或缺陷：首先，國際關係理論缺乏一個國家理論，過分誇大了結構對行動者的決定性影響；其次，由於國際關係理論預設了「國際」與「國內」層次的根本區分，因此無法將全球政治 (global politics) 的整合本質加以理論化；第三，無論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都假設國際體系是靜態的，缺乏國際變遷的理論；第四，由於國際關係理論是靜態的，因此也有強烈的非歷史 (ahistorical) 取向 (2000: 174)。

對於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非歷史主義 (ahistoricism)，Hobson 在兩年後更進一步以「年代拜物主義」(chronofetishism) 與「現時中心主義」(tempocentrism) 兩種謬誤稱之，並認為歷史社會學的取徑可以在這兩個缺陷上提供補救。所謂「年代拜物主義」是指「一組幻覺，把當下呈現為一自主、

<sup>3</sup> 在 Skocpol 所編的《歷史社會學的視野與方法》(*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Skocpol, 1984) 中，更把較早期的 Marc Bloch (1953)、Karl Polanyi (1944 [1957])、S. N. Eisenstadt (1966)、E. P. Thompson (1966) 等人也都包括在內；儘管這些人有些在嚴格意義下並不屬於社會學者，但他們的作品對歷史社會學具有重大啟發與影響。

<sup>4</sup> 社會學在 19 世紀末的歐陸即已逐漸脫離其他學科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美國芝加哥大學在 1892 年成立了第一個社會學系。國際關係成為獨立的科系，則是出現於 1919 年英國的 Aberystwyth，比起社會學晚了將近三十年。

自然、自發、無可改變的系統，這個系統自我構成且恆久永存，因此必然而然模糊了那些促成當下興起、且不斷再構成當下作為一種內在變動秩序的權力過程、認同／社會排除與規範」。至於「現時中心主義」則是指一種幻覺，「把所有的國際體系都視為等價 (equivalent) 且同形 (isomorphic)，以被『年代拜物化』 (chronofetishised) 的現在之持續而規則的速度為特徵，弔詭地模糊了當前國際體系最為基本的組成特色」 (Hobson, 2002: 12)。在這篇充滿詰屈聱牙的自創術語的論文中，Hobson 區分了七種歷史社會學的流派，除了最常被提到的新韋伯學派 (neo-Weberian) 之外，另外還包含了建構主義、世界體系理論、批判的歷史唯物主義、批判的歷史社會學、後現代主義以及結構現實主義的歷史社會學 (structural realist historical sociology)，幾乎把所有帶有歷史傾向的國際關係理論與作品全都涵攝進來。<sup>5</sup>我們可以說，此處指涉的歷史社會學有兩種版本：一是社會學中的歷史社會學，一是國際關係領域中的歷史社會學。國際關係版的歷史社會學，是被如此理解與界定的：「一種批判的取徑，這種取徑拒絕將現在當作置身歷史之外的自主實體，而是堅持將之鑲嵌在特定的社會—時間位置 (socio-temporal place)，從而對 (國際關係理論所產生的) 非歷史主義幻象提供了社會學的補救」 (Hobson, 2002: 13)。本文並打算對歷史社會學做如此寬鬆的認定，因為如此一來，歷史社會學恐怕將失去其獨特的理論傳承與指涉，而成為一種失去特徵的泛稱；而受限於篇幅，本文的討論也將以社會學中的歷史社會學 (尤其「新韋伯學派」) 為主軸，並進而探討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之間的對話。<sup>6</sup>

以上的簡要勾勒，讓我們理解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各自的發展脈絡。然而，為什麼國際關係學者會對歷史社會學——而不是社會學的其他次領域、

<sup>5</sup> 這些被視為歷史社會學的著作包括諸如 Reus-Smit (1999)、Frank and Gills (1996)、Cox (1986)、Linklater (1998)、Ashley (1989)、Walker (1993)、Bartelson (1995)、C. Weber (1995)、Buzan, Jones and Little (1993) 等學者的作品。

<sup>6</sup> 另外一個也常被提及的歷史社會學流派是以 Wallerstein 為代表的世界體系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可說是變形的馬克思主義理論，Wallerstein 以「核心—半邊陲—邊陲」的剝削關係取代馬克思的階級關係，分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如何形成，造成國家／地區之間不平等的發展與宰制。儘管 Wallerstein 的理論對於我們理解主權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不無參考價值，但它的主要關懷還是在於經濟關係與資本邏輯，國家與戰爭僅是資本邏輯運作下的衍生物，本身並未構成獨立的分析焦點，因此本文暫不列入討論。

甚至社會學以外的學科——產生興趣？歷史社會學對國際關係又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從表面上看，最顯而易見的理由之一在於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有著共同的研究興趣，即國家與戰爭。但如果進一步檢視，我們可以發現歷史社會學所能產生的洞見，在於將國家與戰爭重新歷史化，提出重新概念化的可能性。以下，本文將先討論社會學中的「新韋伯學派」，針對其中 Skocpol、Tilly 與 Mann 三位作者的作品作一簡要整理爬梳，並探討他們如何概念化戰爭、國家與國際體系。第三節則將進一步探討歷史社會學對國際關係產生的啟發與影響，並從另一位新韋伯學派的代表人物 Anthony Giddens 的現代性理論，檢討戰爭、國家與現代性（modernity）之間的關係，探索重新概念化的可能性。結論部分，則將探索進一步結合社會學與國際關係，從而研究「全球／國際社會學」的可能性。

## 第二節 新韋伯學派歷史社會學中的「國際因素」： 戰爭與國家暴力

「新韋伯學派」這個標籤大約始於 1980 年代，稱其為「新」，當然要有別於舊的。簡單地說，韋伯的社會學說首先透過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引進美國學界，被有意無意地加以「調和化」之後成為結構功能論的理論基石之一。1970 年代中期開始，人們重新探討韋伯學說當中對國家權力與現實政治的強調，凸顯其中「衝突」而非「調和」的成分，而有了「新韋伯學派」的產生。我們或可說，新韋伯學派之所以新，在於把「理念主義者韋伯」（Weber the idealist）變成了「現實主義者韋伯」（Weber the realist）（Sanderson, 1988）。新韋伯學派的一大特徵，在於其對國家概念的強調並予以擴張解釋。Randall Collins（1986）在其《韋伯學派社會學理論》（*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便主張，韋伯到了晚年已經不那麼強調新教倫理對現代資本主義形成的影響，而把更多的焦點放在現代理性國家（modern rational state）對形塑現代世界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新韋伯學派循著韋伯的理論軌跡，認為現代國家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與浸透著價值理性的公民社會有所不同；而國家與社會在制度上的分化，也正是國家自主性的來源。

新韋伯學派的另一特色，是超越單一民族國家的分析框架，把視野擴展到國際的分析層次。這可以說是研究邏輯的必然。一旦我們將國家予以問題化，

對其起源與行動進行考察時，那麼攸關國家生存的戰爭，以及國家作為集體行動者所處的國際社會，便很難不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中。也正因為如此，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開始有了共同的研究交集，也逐步展開了對話。

Hobson (2002: 174-214) 認為，新韋伯學派歷史社會學可分為兩波，第一波以 Skocpol 與 Tilly 為代表，第二波則以 Mann 與 Hobson 本人為代表。本文不擬作此區分，畢竟這些學者間的異同主要存在於他們對國家的處理方式，而不在於時間的先後。另外一位被歸類為新韋伯學派、但較少被國際關係學者提及的社會學者是 Anthony Giddens。Giddens 的《民族國家與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Giddens, 1985) 一書，其實是系統化地將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組織化暴力加以理論化的一部著作，其分析架構與立場與 Mann 的 IEMP 模型（詳見下文）有不少相似之處。然而，Giddens 比較少被歷史社會學提及，一方面在於他不像 Skocpol、Tilly、Mann 等人從事過實質的歷史研究，而主要以「理論家」知名，二來則在於他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 著重處理「結構—能動性」(structure-agency) 的問題，常被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徵引，因此較少被歸類在歷史社會學一派。<sup>7</sup>以下，筆者將先就 Skocpol、Tilly、Mann 三位作者的作品作一簡要摘述與回顧，並探討國際關係學者如何評價他們的作品；至於 Giddens 的作品，則留待下一節檢視國家暴力與現代性時再另作討論。

## 一、Theda Skocpol：「把國家帶回來」

Skocpol 的成名作為出版於 1979 年的《國家與社會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Skocpol 1979)。這部企圖宏大的著作，主要是比較法國大革命、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與中國共產革命的發生起因與結果。簡要地說，Skocpol 認為當國家積弱，難以應付來自國內外的經濟與軍事挑戰、而國內的農民社會結構又容易引發農民叛亂時，社會革命便會發生。同樣地，對於革命之後的繼起政權來說，能否成功因應這些國內外的結構性危機，也是決定革命結果的關鍵。Skocpol 挑戰過去既有的理論，認為無論從個人心理因素、結構功能論的體系失衡、或是衝突論者所強調的群體利益衝突，均無法滿意地解釋社會革命的發生。相對地，Skocpol 認為必須從三方面來補足過去研究的不

<sup>7</sup> 如被歸為建構學派的 Alexander Wendt (1999) 在討論到結構與能動性的關係時，便引用了 Giddens 的理論。

足：第一是必須採取非志願性（non-voluntarist）結構分析，第二是帶入國際與世界史的脈絡，第三則是必須把國家當成一個獨立的因素來分析。Skocpol 批評過去結構功能論與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取向，未能給國家足夠的能動性，把國家僅僅視為群體利益或階級結構的反映；相對地，Skocpol 提出「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概念，認為國家自主於其他社會結構因素而存在，必須獨立加以分析。前述這三個面向（尤其第二與第三點），使得 Skocpol 的作品受到國際關係學者的青睞。

在 1985 年出版的《把國家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一書導論中，Skocpol 更進一步闡述了國家在當時社會科學研究的不足與未來展望。Skocpol 指出，在此之前，社會科學的研究大多是「以社會為基礎」（society-based），很少提及國家。無論是多元主義或結構功能論大多只把國家或政府視為是多種利益團體的競逐場或功能分化的組織，政策不過是利益團體競逐的結果或組織功能的反映。Skocpol 認為必須把國家視為一個獨立的行動者來加以分析，並再度強調國家自主性與能力（the autonomy and capacity of states）作為分析概念的重要性。這本書結合了社會學者、比較政治學者、政治經濟學者、國際關係學者的研究成果，可說是設定議題（agenda-setting）的一本里程碑之作。

國際關係學者對 Skocpol 的批評，主要在於下面幾點。首先，Skocpol 雖然說要把國際體系帶入分析，但實際上她的研究所觸及的國際體系，除了戰爭，幾無他物。換言之，對 Skocpol 來說，所謂國際體系也不過就是戰爭而已（Hobden, 1998: 92）。由於 Skocpol 把國際體系化約成戰爭，她的分析也被認為隱含了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預設，除戰爭之外無體系可言。其次，國際關係學者對 Skocpol 的另一個批評，在於認為她雖然聲稱要「把國家帶回來」，但實際上，在她的分析裡，國家只有一半的能動性：國家只有在國內層次具有獨立於階級與社會結構之外的能動性，然而在國際層次，國家無能改變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與國際結構的限制，只能是個被動的因應者與接受者。Hobson 乃據此認為，Skocpol 其實並沒有「把國家帶回來」，反倒是「把國家踢出去」（kicking the state back out）了。持平而論，Hobson 指出 Skocpol 概念中的國家缺乏國際層次的能動性，是一針見血的批評；但若因此認為 Skocpol 的分析是「把國家踢出去」，則難免有譁眾取寵、以偏概全之嫌。如果我們考量到 1980 年代之後社會科學界對國家研究的重視並產生許多重要的作品，則 Skocpol 與其他學者呼籲「把國家帶回來」的呼聲，功不可沒。也正

是因為如此，Skocpol 的作品才能獲得國際關係學者的重視。透過「國家自主性」的概念，她的確也賦予國家相當高度的（國內）能動性，這是過去研究所缺乏的面向。如果僅僅因為她未能賦予國家充分的國際能動性，就認為她把國家踢了出去，恐怕有失偏頗。

## 二、Charles Tilly：國家製造戰爭、戰爭造就國家

Tilly 出道與成名都比 Skocpol 來得早，主要以研究歐洲大規模的長期歷史變遷而知名，時間跨度動輒上百乃至千年。Tilly 一開始也是研究集體行動與暴力動亂，著述甚豐，但他引起國際關係學者關注的作品，主要還是集中在他對國家與戰爭的探討上。

Tilly 對於國家形成與戰爭之間的關係，肇始於他 1975 年編輯的《西歐的國家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一書（Tilly, 1975）。在這一系列與 Stein Rokkan 等人所共同進行的研究中，Tilly 逐漸發現戰爭與西歐的國家形成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並以一句膾炙人口的經典表述總結其關係：「戰爭造就國家，國家製造戰爭」（War made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made war. Tilly, 1975: 42）。在其後出版的另一篇知名論文〈製造戰爭與建造國家乃組織化犯罪〉（“*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收在 Skocpol 等人合編的《把國家帶回來》一書），Tilly 更以一種諧謔的口吻說，推到極致來看，現代國家以國家安全之名向人民強制徵稅以維持常備軍隊，這種行徑其實與黑社會幫派向地盤內的居民勒索保護費沒有兩樣，如果後者被視為組織性犯罪的話，那麼國家便是最大的組織性犯罪集團（Tilly, 1985）。Tilly 的這種觀點，背後其實延續了韋伯對國家的經典定義，也就是把國家視為「宣稱對合法暴力之行使擁有壟斷的人類社群」（Weber, 1946: 78），這也是「新韋伯學派」的特色之一。<sup>8</sup>

<sup>8</sup> Tilly 的主要貢獻之一，在於他將組織化暴力放到國家問題意識的核心，一方面鬆動了社會科學對既有分析單位（國家）的劃分，一方面也修正韋伯的國家定義，認為「合法」與「非合法」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不是國家的必要條件。的確，透過 Tilly 對歐洲國家形成的歷史考察，我們發現，在強制、榨取與征戰的過程中，內部（國內）與外部（國際）的界限經常是變動的，而在合法性問題上，所謂「對合法暴力的壟斷」其實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早期的國家形成過程中，合法與非合法的區分並不清楚，國王經常與土匪、海盜或擁有武力的封建領主結盟，而對於後三者來說，擁有組織化暴力的工具並不存在所謂「非法」的問題。

對 Tilly 來說，國家與戰爭之間的關係，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互為因果，循環不已。Tilly 曾經提出兩種理論模型，分別代表他不同階段的思考。在第一個階段，Tilly 主要集中探討國家形成、戰爭製造、資源榨取與資本積累之間的因果關係，這幾個因素之間的關聯，可用圖 11-1 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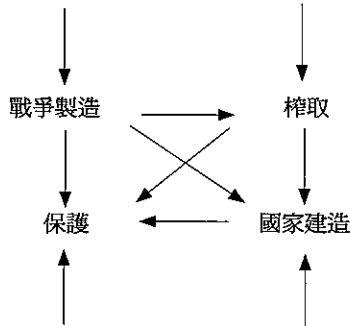


圖 11-1 戰爭製造與國家建造 (Tilly, 1985: 183)

Tilly 認為，製造戰爭、榨取、建造國家與保護四者是相互依賴的。在理想化的序列中，一個偉大的領主發動戰爭，使其能在領地內稱王，然而發動戰爭導致他需要從當地人口中榨取更多的戰爭工具——人丁、武器、食物、住宿、交通、後勤供給，以及／或能夠買到上述之物的金錢。累積戰爭能力，也意味著榨取能力的提昇。而榨取活動若能成功，意味著該領主有能力在其領地中排除其他潛在的競逐者、或獲得競逐者的合作，這個過程便導致了國家的形成。為了遂行榨取，需要創建包含徵稅的代理人、治安警力、法庭、國庫等組織；而至少在戰爭一事，國家也需要常備軍隊、軍需工業、官僚組織以及稍後出現的軍事學校等。這些國家機器的建立遏止了其他競爭者或反對者的出現。國家的管理者與領土內的社會階級結盟，後者提供必要的資源與技術協助以換取保護，防止敵人或其他競爭者的入侵。這一連串的過程解釋了歐洲國家的出現 (Tilly, 1985: 182-183)。

到了 1990 年，Tilly 出版《強制、資本與歐洲國家》(*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一書時，對於上述模型已經有所修正。他承認過去的模型過於單一線性，背後假設了一條戰爭→榨取→壓制→國家形成的單一路徑，難以解釋歐洲歷史上出現的諸多國家形態之間的巨大變異。為了補足這個缺失，Tilly 提出了新的模型，我們可用圖 11-2 的圖示來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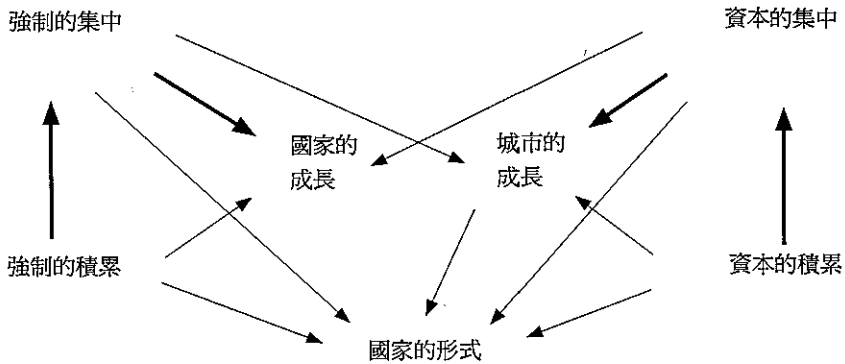


圖 11-2 強制、資本、國家與城市之關係 (Tilly, 1990: 27)

從這個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Tilly 用「強制」這個統稱概念來涵蓋他先前指稱的戰爭與榨取，而在圖的右半邊，Tilly 增加了資本與城市，為原來的模型所無。一方面，Tilly 發現經濟（資本累積）有其自身運作的邏輯，無法化約到軍事或政治上面；另一方面，由於資本的累積也直接涉及戰爭能力的提昇（換取戰爭所需資源），因此對於國家形成也產生無可忽視的影響。

然而，如果仔細考察圖 11-2 的模型，我們也將發現，城市與資本這組變數的加入，其實主要是拿來解釋國家形態的變異性；真正直接促成國家形成的，還是強制。所謂強制，指的包括「所有威脅或實際行動的協調應用，這些行動通常給那些清楚這些行動及其潛在損害的個人或群體的人身或財產帶來傷害」（Tilly, 1990: 19）。正如資本界定了剝削的領域一般，強制界定了宰制的領域。強制的手段包括陸軍、海軍、治安警力、武器、以及其他等價之物；這些手段如資本一般，可以累積，也可以集中。有些地區的強制手段不多，但很集中；有些地區的強制手段很充沛，但相當分散。當強制手段的累積與集中攜手並進、同時增長時，國家便產生了。透過這個模型，Tilly 認為歐洲國家形成可以被集中資本、集中強制、戰爭準備及國際體系中的位置這幾個變數所解釋，而其中最關鍵的，還是在於戰爭與戰爭準備：

打敗仗的國家通常變小，而且經常就此滅亡。無論大小，能夠擁有最多強制工具的國家容易贏得戰爭；效率（投入產出比）比不上效能（總產出）。（Tilly, 1990: 28）

Tilly 的理論隱含了濃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色彩：優勝劣敗，適者生

存，不適者淘汰。能在「戰爭—榨取—強制」的過程中獲勝的就成為國家而留下來，失敗者將被淘汰，從歷史中消失。在歐洲歷史發展過程中，能夠在這場激烈競爭中獲勝而存活下來的，不是帝國、不是城邦、也不是其他擁有組織化暴力的盜匪集團，而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民族國家。

如同 Skocpol 一般，國際關係學者對 Tilly 的批評，也是認為他隱含了現實主義的預設：國家只能設法適應無政府狀態，但無法超越或改變之。雖然 Tilly 在後來加入了資本變項，把資本邏輯加入國家創建的過程，但和 Skocpol 一樣，資本也只是被概念化為國家拿來適應無政府狀態的一種工具而已（Hobson, 2000: 191）。另外，Hobden（1998: 114-116）認為 Tilly 比起 Skocpol 更有體系的概念，而非僅把國際關係等同於戰爭，但這恐怕僅是 Hobden 的個人詮釋。Tilly 雖然也討論統治者與競爭者之間的聯盟或網絡關係，但體系的概念，從未在他的分析中出現過。<sup>9</sup>

### 三、Michael Mann：社會權力的來源與 IEMP 模型

如果 Skocpol 與 Tilly 都有傾向過度化約的危險，過分強調戰爭對社會革命或國家形成的決定性影響，那麼 Mann 所提供的，無疑是較為全面且較無決定論色彩的圖像。和 Skocpol 與 Tilly 比起來，Mann 的研究時間跨度更長（上溯整個人類歷史）、空間分布更廣（遍及世界文明），但他的理論也因此顯得更複雜、更瑣碎。此處的討論，將以《國家、戰爭與資本主義》（*State, War and Capitalism*, Mann 1988）以及兩卷《社會權力的來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Mann 1986, 1993）為主。

在《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一卷中，Mann 提出了知名的 IEMP 模型作為其

<sup>9</sup>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Tilly 有幾分誇張聳動的經典表述：「戰爭造就國家，國家製造戰爭」，在學界有人以「提利命題」（Tilly Thesis）稱之，並嘗試批判或超越之。如歷史社會學者 Philip Gorski（2010）便以「超越提利命題」為題發表論文，認為西歐歷史上的國家並非如 Tilly 所說那麼窮兵黷武，君王對於家族或朝代延續的看重可能更甚於擴張領土與壓榨資源，而透過聯姻等方式，君王其實企圖要避免戰爭而非製造戰爭。Gorski（2003）的研究也指出，除了軍事與資本的影響外，宗教與文化理念所產生的規訓技藝與策略對於歐洲早期現代國家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影響。下面所要討論的 Mann 所採取的綜合式韋伯派立場，其實也是將文化理念（意識形態）獨立出來分析，避免了 Tilly 過度誇大或片面的分析取向。

理論架構，其中 I 代表意識形態，E 代表經濟，M 代表軍事，P 代表政治。這四種社會權力的來源，各有各的運作邏輯，不能相互化約，但卻又彼此高度交織牽連，構成了複雜的權力網絡圖像（參見圖 11-3）。到了第二卷，Mann 進一步闡釋了他的現代國家理論。Mann 首先檢視了五種國家理論：階級論、多元主義論、菁英論、制度國家論，以及混亂論（cock-up or foul-up theory）。Mann 採取的是一種調和折衷的立場，認為上述五種理論雖均有所不足，但也都有可取之處，而他個人尤其偏向韋伯的傳統，對國家採取制度性的定義（institutional definition of the state）。Mann 對國家的界定為：（1）國家是一組分化的組織與人員；（2）體現了集中性，意為政治關係是輻輳於一個中心，涵蓋了；（3）一個領土界定清楚的區域，在這個區域之上；（4）行使某種程度的權威，制訂必須遵守的規則，並以某些組織化的武力作為後盾。Mann 認為自己和韋伯最大的不同在於，韋伯認為國家壟斷了武力手段，但 Mann 認為歷史上許多國家並沒有壟斷武力，而即使是在現代國家，很多武力手段也自主於國家之外，沒有被國家壟斷（Mann, 1993: 54-55）。Mann 的這點歧見與 Tilly 有幾分類似，因為 Tilly 也在其研究中指出，在西歐國家的建造過程中，國家並沒有像韋伯所說的那樣真的壟斷武力；相反地，早期的君王經常要藉助莊園領主甚至海盜土匪的武裝力量來幫忙打仗。但嚴格說來，這也許是對韋伯定義的某種程度的誤讀。韋伯的國家定義強調的是「成功地維持住其對合法使用武力具有壟斷的宣稱」（successfully upholds the claim to the monopoly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force，斜體為原文所有，Weber, 1978: 54），換言之，國家並不真的壟斷了武力，而是「成功地宣稱其壟斷」，而且國家並不宣稱壟斷所有的武力，而僅有「合法使用的武力」。因此，國家是否在事實上壟斷了所有的武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要能夠成功地宣稱壟斷，而其武力行使必須被認為是正當的。

除了強調國家的制度性（而非功能性）定義外，Mann 更進一步強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理解國家（與政治）的一個重要關鍵；政治與地緣政治是交織纏繞、無法分開的。他進一步引述 Randall Collins 詮釋韋伯政治學時的話說，「政治是從外向內運作的」（politics works from the outside in, Mann, 1993: 56）。將軍事力量（武力）視為獨立的權力來源、結合上對地緣政治的看重，使得戰爭在 Mann 的歷史分析佔了重要的地位，這不只見於兩卷的《社會權力的來源》，也廣見於他的其他著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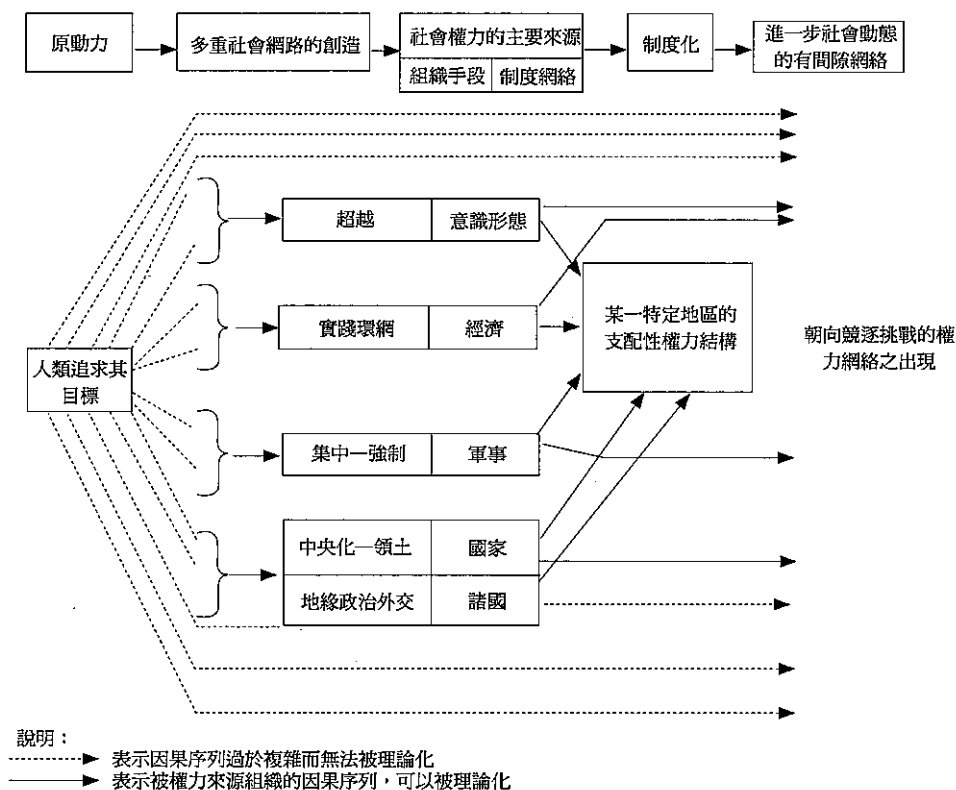


圖 11-3 社會權力的來源：Mann 的 IMEP 模型 (Mann, 1986: 29)

《國家、戰爭與資本主義》一書雖出版於 1988 年，看似比《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一卷來得晚，但其實其中所收論文大部分完成於 1976-1986 年間，比起後者來得稍早。這本書中尚未出現 IEMP 架構，但集中在經濟、軍事與政治三種權力來源的分析。在本書的序言中，Mann 特別提及，地緣政治在他的分析中並不構成第五種權力的來源，而是一種運用在外的政治，但通常注入了大量軍事權力在裡面 (1988: ix)。和 Skocpol 與 Tilly 不同的是，Mann 的著作並非針對特定的社會或政治現象提出解釋（例如解釋歐洲國家的形成或社會革命的發生），而是嘗試在人類政治社會組織形成的漫長歷史中，給予戰爭與軍事相當重要的解釋地位。雖然 Mann 在其著作中再三強調，這幾個權力來源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各有其重要性，沒有哪一個權力來源具有決定性的支配地位，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對政治與軍事力量的分析與強調卻佔去了大部分的篇

幅。尤其在解釋現代資本主義體系的興起時，他認為軍事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攜手共進、相輔相成的。

和前面兩位作者比起來，Mann 的理論較無化約論的傾向，但也正因如此，他在社會學界面臨「龐雜而不夠簡潔」、「缺乏理論簡約性」的批判（Sanderson, 1988）。Mann 也曾經批判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認為他們對於國際體系的想像過於簡單化約；現實主義只把國際體系視為是受到國家利益的制約，這樣的觀點從 Mann 的理論來看是遠遠不足的。Mann 拒絕使用「體系」的概念，因為他認為在解釋人類存在的結構時，沒有任何行動者或社會力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和大部分的人不同，Mann 不把社會當成封閉的實體，而主張社會是由不同的權力網絡交織而成的。同理，Mann 也不承認有「國際社會」或「世界／全球體系」的存在，主張必須由多重交疊的權力網絡來分析。這開啟了「多形態國家」與「多重因果」分析的可能性，對國際關係學者來說頗有啟發性（Hobson, 2000: 198-203）。

### 第三節 重新概念化「戰爭」與「國家」：現代性與組織化暴力

透過以上討論，我們發現，國際關係學者對於三位新韋伯學派的歷史社會學者的作品，並不完全滿意。他們都沒有發展出令人滿意的關於國際關係或國際體系的理論，而他們對戰爭的分析，其實隱含了很多新現實主義的預設，或是直接受到新現實主義的影響。從國家的能動性來看，Skocpol 與 Tilly 所概念化的國家，其實都只是國際體系結構的被動接受者，他們在無政府秩序的國際社會中從事戰爭，但卻無能改變國際體系的結構本身。從這點來看，Skocpol 與 Tilly 其實都沒有超越國際關係的「新現實主義」太多。在此情形下，為什麼國際關係學者對歷史社會學的作品仍顯露出如此高度的興趣呢？Hobden 認為，歷史社會學對國際關係有所啟發，主要在以下幾點：首先，是對歷史的強調，或是將歷史納入作為一個新的變項（variable），將國際體系的分析單位（國家）及國際體系本身加以歷史化（historicise）；其次，則是對國際／國內因素的同時強調，考察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或關聯，尤其 Skocpol 的作品，使得國際關係學者開始重視國內政治對一國外交或軍事行動的影響，也使國際關係學者對於社會革命開始產生研究興趣（Hobden, 1998: 186-187）。Hobson

則是更進一步指出，歷史社會學對於新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可能產生的貢獻，可從下面五個方面來理解。第一，Waltz 的國際體系理論為了達成「科學分析」的目的，假設處於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彼此都是相同或類似的，因此國家被當成「同樣的單位」（like units）來加以分析。然而，透過歷史社會學的考察，我們發現，歷史上大部分國家所面臨的具體情境都是彼此不同的，因此「同樣的單位」的假設若非不存在，也僅能說是異例。其次，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從一開始便排除國內政治對國際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把每個國家當成彼此區隔、自我構成的實體（self-constituting entities）；然而，歷史社會學則指出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第三，新現實主義把各政治單位（國家）之間的疆界視為既定，但歷史社會學則提醒我們必須注意到主權的空間關係或空間分化（spatial differentiation）的過程。第四，Waltz 認為「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與「國際間的階層體系」是兩個彼此互斥的情境；然而，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則是發現，無政府狀態與階層體系並非彼此互斥，而是可以同時共存的。第五，新現實主義假設世界僅存在一個單一的國際體系，忽略了多個國際體系同時並存的歷史事實。歷史社會學則可幫助我們探討體系間（inter-system）與社會間（inter-societal）的關係（Hobson, 2002: 15-19）。

另一方面，被稱為「新韋伯學派」的歷史社會學，放在社會學自身的發展脈絡來看，則歸屬於「第二波的歷史社會學」。如果從社會學自身的發展進程來看，在 Skocpol、Tilly、Mann 等第二波之後，歷史社會學是否歷經了「第三波」的發展？而第三波歷史社會學對國際關係理論，是否仍具有任何相關性或啟發性？2005 年，一群直接受到第二波歷史社會學啟蒙或影響的新一代社會學者出版了一本題為《再造現代性》（*Remaking Modernity*）的編輯專書，可說是第三波歷史社會學的標竿（Adams et al., 2005）。在本書的導論中，Julia Adams、Elisabeth Clemens 以及 Shola Orloff 等三位編者標舉出五個第三波歷史社會學的新焦點：（1）制度論；（2）理性選擇；（3）文化轉向；（4）女性主義的挑戰；以及（5）對歐美以外地區的探討，包括對帝國、殖民與後殖民、以及世界體系的重新概念化。上述這五個焦點，前四者大體上屬於理論視角或分析架構的轉換，而這些新的理論視角或架構也同時見於國際關係領域的新興發展趨勢中。而這五個新焦點中，最能夠與國際關係領域產生對話乃至扣連的，還在於第五項，也就是主題與範疇的擴大化。在此，我們有必要對此作進一步的深入考察。

從表面上來看，國際關係學者與新韋伯學派歷史社會學之間之所以能夠展

開對話，顯而易見的理由之一在於兩者關注的議題的一致性，即國家與戰爭。然而，除了這個表面上的親近性外，筆者認為還有幾個更根本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歷史社會學如果提供了任何根本的洞見，在於指出國家、戰爭／組織化暴力與現代性之間的緊密關聯。這個關聯，在 Giddens 的現代性理論中得到進一步闡釋（Giddens, 1985, 1990）。Giddens 是少數將國家與組織化暴力——甚至包含國際關係——納入其理論體系的社會學者，<sup>10</sup>他和 Mann 相近，都採取一種制度的分析視角，把軍事權力視為獨立的因素來加以分析。Mann 將人類社會的權力來源區分為四種，彼此交織牽連而不能相互化約，Giddens 則是把現代性視為是四種制度叢結（institutional clusters）共同作用的結果：資本主義、工業主義、軍事權力與社會監控。這四個制度叢結具有自身的發展邏輯，彼此相互影響，但無法彼此化約（參見圖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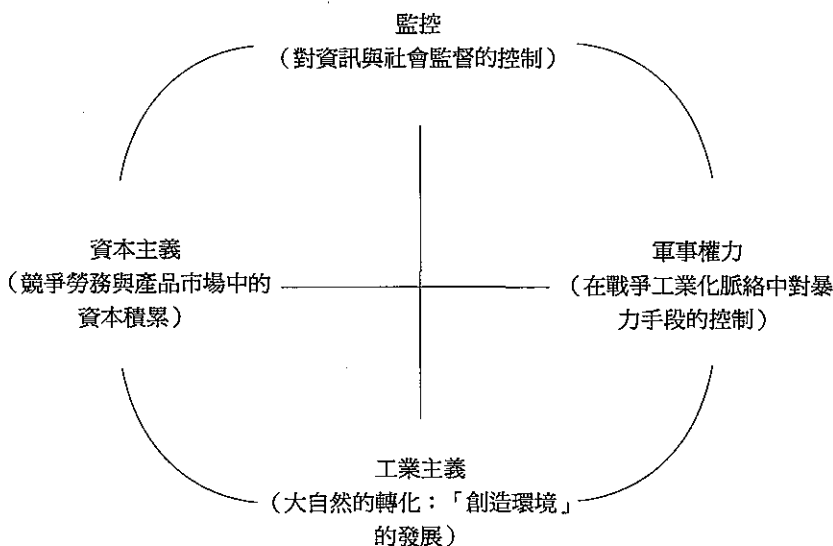


圖 11-4 現代性的制度面向 (Giddens, 1990: 71)

<sup>10</sup> Giddens 雖然沒有特別針對國際體系加以理論化，但他在談到民族國家的興起時，特別指出民族國家只能存在於與其他民族國家的系統關係（systemic relations）之中；「國際關係」與民族國家的起源是同一時代（coeval）的（Giddens, 1985: 4）。這可說是相當典型的、帶有建構主義意味的社會學者對國際關係的看法。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Giddens 的這段話也充分說明了為何國際關係作為一門建制化的學科會出現在 1919 年，一個酣戰方歇、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

和 Tilly 對強制工具的分析相近，Giddens 延續了韋伯式的國家命題，把暴力手段的集中壟斷視為是現代民族國家興起的主要特徵；但和 Tilly 不同的是，Giddens 更注意到暴力手段出現的現代脈絡，亦即戰爭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19 世紀期間，英國（以及其他西歐殖民者）在海外發動了大大小小的殖民地戰爭，採用的是藉由現代工業科技所製造的武器，而其結果是工業化國家一面倒地打敗了農業（或工業較落後）的國家。「機關槍」（machine gun）一詞給戰爭的工業化一個極為簡潔的表述：機器（工業）與武器（軍事）的結合。戰爭的工業化指的不僅是應用新的科技來製造武器，還包括科技所帶來新的交通、通訊等後勤方式的改變、新的戰術出現、軍人的職業化等。兩次大戰所帶來的史無前例的殘暴殺虐與「全體戰」（total war）概念的出現，可說是戰爭工業化的必然後果與極致表現。Giddens 認為，這種發動工業化戰爭手段的全球散布，使得我們今日處於「軍事社會」（military societies）中。<sup>11</sup>Giddens 認為民族國家的暴力壟斷與世界的軍事秩序，雖然都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但我們卻不能把軍事權力的集中視為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畢竟兩者所依循的邏輯與行為者都十分不同（Giddens, 1985: 222-254）。這和 Tilly 與 Mann 的分析，其實是相當一致的。

如果現代社會的出現和國家與戰爭（組織化暴力）無法分割，那麼我們可以追問：這樣的狀態將持續多久？未來又將如何演變？當前「後現代」與「全球化」的口號甚囂塵上，這對國家與戰爭又將可能產生何種影響或改變？以下，筆者將分別從國家與戰爭兩個方面提示一些線索，作為進一步思考的參照：

## 一、民族國家的角色與未來

當代社會學與國際關係，都建立在民族國家的預設之上，因此社會學以民族國家的疆界作為社會分析的單位，而國際關係則以主權國家的行為及其所形

<sup>11</sup> Giddens 的這個論點顯然是要與啟蒙以來的和平進步觀唱反調。19 世紀許多社會思想家，例如孔德（Auguste Comte）與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等人都樂觀地相信人類文明已從「軍事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戰爭將會減少，人類社會將會愈來愈趨於和平。然而，19 世紀歐洲人的啟蒙和平觀，卻是建立在一件諷刺的事情上：因為戰爭已經被輸出到歐洲以外的殖民地了，那些成為犧牲在工業主義與軍事主義結合之後「堅船利砲」下的受害者，都是歐洲以外的非白種人。

成的國際社會／國際體系作為研究對象。然而，被當作預設基礎的民族國家，卻正面臨新的挑戰與改變。從 1990 年代開始，隨著歐盟成形、冷戰解體、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席捲各地，有關「民族國家的終結」或「後國族時代」（post-national era）的呼聲不斷出現（Held, 1990; Ohmae, 1995; Sassen, 1996; Appadurai, 1996）。儘管民族國家健在如故、民族主義的浪潮有增無減，但我們的確看到許多新的力量與行動者浮現於世界舞台（例如跨國的非政府組織與企業等），而新興議題（生態環保、人權、人道救援，乃至全球金融危機等）在主權國家之間都形成新的關係與議題領域。過去一般所稱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與低政治（low politics）之間的界線不再涇渭分明，而有彼此相互滲透影響的趨勢。無論社會學或國際關係，對此都已有不少研究投入其中。<sup>12</sup>此處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這些新的力量與發展，是否足以改變人類政治生活的基本型態，使得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預設的國家中心主義（statism）失去顯著性？從目前的發展看來，恐怕言之過早。根據 Tilly 與 Mann 的分析，國家可能與這些潛在競爭對手形成新的結盟，造成更多的資源榨取與暴力壟斷。更根本的是，如果戰爭／組織化暴力乃現代國家之一體兩面，那麼除非我們能夠想像一個沒有戰爭與組織化暴力的世界，否則侈言（民族）國家的衰亡恐怕只是痴人說夢。在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檢視戰爭與組織化暴力的未來。

## 二、關於戰爭與組織化暴力

現代性最大的弔詭——或者說，現代化論述最大的謊言——在於，現代性的興起與包含戰爭在內的各種組織化暴力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各種版本的現代化論述若不是忽略戰爭，就是提供人們和平的遠景假象。<sup>13</sup>（從這個角度看，國際關係比起社會學倒是較為誠實且貼近現實得多。）兩次大戰見證了人類史上迄今最慘烈殘酷的大規模殺戮，但人們由此學到多少教訓，恐怕不能太過樂觀。儘管也有學者（例如英國的 Martin Shaw）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

---

<sup>12</sup> 例如 Sklair (1995)、Boli and Thomas (1999)、Yearley (1996)、Risse-Kappen (1995) 等。另可參見本書有關全球治理的章節討論。

<sup>13</sup> 關於現代性的戰爭與暴力本質如何在主流社會科學論述中被掩蓋，可參見 Lawrence (1997) 與 Joas (2003) 的討論。除了源於啟蒙理性的和平進步觀之外，現代國家的各種綏靖技藝（pacifying techniques）也是讓人們對當代社會產生和平幻覺的因素之一。

度論證 1945 年以後的國際體系標示了世界史中的一個斷裂，但我們恐怕距離進入其所宣稱「後軍事社會」（post-military society）尚早（Shaw, 1991）。<sup>14</sup> 廣島與長崎或許讓人見識到戰爭可能帶來的終極毀滅，但這卻諷刺地造成了冷戰時期的核武競賽。奧許維茨（Auschwitz）也許讓許多人警覺到國家暴力的可怖、必須加以防範，促進基本人權作為普世價值的共識，也使得狹隘的國族主義一時不敢過於張狂。<sup>15</sup> 然而衡諸今世，由國家壟斷的暴力依然存在，且其形式與數量有增無減。尤有甚者，911 之後，新的暴力手段與戰爭被想像出來並被具體實踐，想像無限擴大，戰爭不再限於主權國家之間，而反恐戰爭（war against terror）也深入到日常生活，體現在機場、港口、地下鐵與大型集會的各色各樣安全檢查措施與「小心提防周遭可疑物品與人物」的每日宣傳上。而其結果，是造成國家暴力手段藉由警察、治安、鎮暴、監視／聽、「維穩」等形式更進一步強化與擴大。<sup>16</sup> 這似乎反諷意味十足地印證了 Tilly 的論證：國家乃組織化暴力集團，人們現在似乎被迫更加依賴這個暴力集團來保護自己免受其他暴力集團（如恐怖組織）的侵害，而弔詭的是，如果沒有國家，恐怖份子也許根本不會存在。Tilly 的「國家—戰爭」循環相生理論，在 21 世紀的今天以新的形式繼續體現著。從研究的角度看，國際關係學者也許忙著更

---

<sup>14</sup> Shaw 的「後軍事社會」與孔德、史賓塞等人認為現代社會是從「軍事社會」進步到「工業社會」的觀點有所不同；Shaw 與 Giddens 相同，都認為現代社會本質上是軍事社會，但他進一步認為，二戰之後的世界局勢演變，已經使人類歷史進入了「後軍事社會」。但正如「後工業社會」、「後現代社會」等概念一般，後工業／後現代社會的存在一定以工業／現代社會的存在為前提，後工業／後現代並不代表工業或現代的消失；同樣地，後軍事社會也不能理解為軍事社會不復存在，僅能視為後者之新的衍生形式與內涵。

<sup>15</sup> 有關現代性與大屠殺的內在聯繫，可參見 Bauman（1989）。

<sup>16</sup> 在這個問題上，傅柯（Michel Foucault）有關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生命政治（bio-politics）與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分析可說卓見洞見，也在各不同學科領域引發了難以數計的相關研究與討論。參見 Foucault（1979, 1991, 2007, 2008）等。值得一提的是，根據香港《明報》2010 年 3 月 6 日報導，中國在 2008 年奧運之後，投入在公安（含武警與「維穩」——意即「維持穩定」）的經費預算已經與投入在解放軍的國防預算不相上下（參見林和立，2010）。傅柯意義下的「社會內戰」（war within society）已經與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等量齊觀。利用傅柯的生命政治概念來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可參見 Dillon and Neal（2008）。

新國際或國家安全 (international/national security) 的定義與理論架構，甚至重新以文明衝突來理解新的世界秩序與衝突所在 (Huntington, 1996)，然而，如果我們沒有看清現代性與民族國家的暴力本質，則和平的寄託安在？這樣的惡性循環又將伊於胡底？

#### 第四節 結語：邁向「國際關係／全球社會的歷史社會學」

Hobson & Hobden 在論及國際關係理論的非歷史主義時，形容國際關係的研究議程 (research agenda) 由於缺乏歷史縱深，就如同患了天氣風向症候群 (weather-vane syndrome) 一般，隨著每天陰晴風雨而變易不定。當戰爭看似式微時，就認為自由主義勝過現實主義，惟一旦波灣戰爭爆發，則現實主義又宣布勝利；一下子認為戰略研究 (strategic studies) 已無必要，但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核子競賽又使人們開始研究國際安全戰略。如此風風雨雨、陰晴不定，使得國際關係研究只是追隨時事潮流打轉而缺乏自己的設定議題。這一切都歸因於國際關係理論過分囿於以工具化的方式解讀當下歷史 (instrumental understanding of present day history)。反之，歷史社會學拒絕以工具化的方式理解當下，退一步反思當下 (與過去) 的歷史，甚至將國際關係理論的預設加以問題化，因此能夠幫助研究者得到較為寬闊的視野與更堅實的基礎來形成自己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議題 (Hobson & Hobden, 2002: 284-285)。

在談到未來的發展方向時，Hobson & Hobden 具體列舉了十個可繼續發展的主題領域：(1) 體系間／跨體系與社會間／跨社會分析 (inter-systemic/trans-systemic and inter-societal/trans-societal analysis)；(2) 體系內與社會內變遷 (intra-systemic and intra-societal change)；(3) 空間之間的分析 (inter-spatial analysis)；(4) 空間—時間分析 (spatio-temporal analysis)；(5) 從國家間到全球的分析架構 (from the inter-state to a global analytic framework)；(6) 以單位為基礎的分析 (unit-base analysis)；(7) 以社會權力為基礎的分析 (social power-based analysis)；(8) 結構化過程的分析 (structurationist analysis)；(9) 認同形構的分析 (identity-formation analysis)；(10) 批判與規範的分析 (critical and normative analysis)。這串清單雖然看起來企圖宏大、洋洋灑灑，但背後其實缺乏一個根本的思考架構或理論基礎，研究理論的

學者看了恐怕要啞然失笑。從表面上來看，這份清單幾乎無所不包，涵蓋了大部分目前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研究形態，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份焦點模糊的清單反而失卻了提示的力道。再者，Hobson & Hobden 所羅列的這些主題領域，很多是在其他學科早已著手從事的研究，因此，這種包山包海的提案，其實並不切實際，恐怕也未能凸顯出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結合之後能夠產生的洞見與力量。

一言以蔽之，歷史社會學能夠給國際關係理論帶來補充的，一在「歷史」，二在「社會」。換言之，我們必須對歷史敏感，又同時需要對國際社會的「社會學面向」予以關心。進一步說，「社會」與「歷史」也並非不相干或互斥的兩個概念，而應彼此結合。誠如英國學者 Philip Abrams 所說：「社會學的解釋必然是歷史的。因此，歷史社會學並不是某種特殊的社會學；毋寧說，它是這個學科的本質」（Abrams, 1982: 2）。主流的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都因受到實證主義的強烈影響而有非歷史化的傾向，把當下當成恆久不變的現實。歷史社會學的視角帶入時間的面向，使我們認知並反省到主流理論的非歷史預設，終究是站不住腳的。如果國際關係理論必須隨著國際現實的變動而有所調整，那麼我們的確面臨了該重新檢討概念工具與理論架構的時候。歷史社會學可以幫助我們把握這個脈動，這也是歷史社會學能提供啟示之處。

廣義來說，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產生交集，並不始自 1970 年代，也不限於新韋伯學派歷史社會學。早在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法國社會學者 Raymond Aron 便曾撰寫大量有關國際關係的作品，更以《和平與戰爭》為題發展出其國際關係理論（Aron, 1966[2003]）。<sup>17</sup>雖說不同學科由於預設不同、發展軌跡迥異，往往難以彼此溝通，但學科與學科之間的對話，不僅有助於彼此之間的相互理解，更能給原來的知識領域帶來新的刺激。原來受社會學訓練、後來投入國際關係研究的 Martin Shaw 曾提出如下觀察：「對於來自社會學這個星球的訪客來說，國際關係有種 1950 年代主題樂園的魅力，很多早已被拋開、或是在其他領域似乎已經得到解決的問題，在這裡卻像是新鮮事一般不斷地冒出

---

<sup>17</sup> 也許因其保守派的立場所致，Aron 這部苦心孤詣的著作，在社會學與國際關係領域皆受到冷落。Aron 從理論、社會學、歷史與實踐學（praxeology）四個方面來探討國際關係，其取徑與本文所討論的歷史社會學有很大不同，但可看出他對當時冷戰結構下的軍備核武競賽的憂慮與對世界局勢的深沈關懷。

來。」(Shaw, 2000: 82) 尤其有關結構與行動／能動性、宏觀與微觀、客觀現實與主觀建構等問題，在社會學界可說已是老生常談，在國際關係學界卻似乎仍是個新穎的理論問題，各種爭奇鬥豔的概念術語如雨後春筍一般競相湧現，令人目不暇給。但另一方面，國際關係學者所熟悉的國際結構與事務，例如地緣政治、世界秩序、戰爭與和平等，社會學者卻很少納入視野，即使有也至多只佔據了邊緣的地位。比起國際關係對於社會學的熱衷，社會學界對國際關係這個相鄰領域始終顯得無知且漠不關心，這也使得社會學的分析為此付出了代價。<sup>18</sup>再者，除了透過學科之間的對話以促進跨科際 (interdisciplinary) 研究外，學科之間的界線可能鬆動模糊，也有可能重組。無論社會學或國際關係，本身也在發展變化當中。例如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在社會科學各領域出現的建構主義、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等風潮，同樣也逐漸流行於國際關係領域。國際關係學界近年來也開始研究起認同與文化治理 (cultural governance) 的問題，甚至把文化視為「軟實力」(soft power) 而納入國際政治的分析 (Nye, 2004; Shapiro, 2004; Vandersluis, 2000)，而歷史記憶與教科書也成為國際關係學者研究的課題 (Callahan, 2006; Gong, 2001)，這些在過去幾乎可說是不可想像的。歷史社會學與國際關係的交會，使我們得以將被當成預設背景的民族國家加以歷史化，從而認識到一個「國際關係／全球社會的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society) 的可能性與必要性。<sup>19</sup>更重要的是，本文的考察提醒我們：重點不在於學科的界線，也不在知識的系譜，更不在那些繁瑣炫目的理論框架與概念術語。如何面對當前的共同問題 (現代性與國家暴力)，有效地理解並改變這個世界，才是首要的任務。

---

<sup>18</sup> 關於此點，可參見國際關係學者對歷史社會學的批評，如 Smith (2002)、Halliday (2002) 等。

<sup>19</sup> Hobden & Hobson (2002) 所編的論文集便是以「國際關係的歷史社會學」而非「國際關係與歷史社會學」為題。關於世界社會 (world society) 或世界政體 (world polity)，社會學另有一支制度論 (institutionalism) 的傳統，可以進一步與國際關係理論 (例如新自由制度主義) 產生對話。參見 Boli and Thomas (1997, 1999)、Meyer (1987)、Meyer et al (1997) 等。

## 參考文獻

- 林和立，2010，〈中國成為超級員警國家〉，香港《蘋果日報》，3月11日。
- Abrams, Philip. 1982.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dams, Julia,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 (eds.). 2005.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Perry. 1974.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LB.
-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ron, Raymond. 1966[2003]. *Peace & War*.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Ashley, Richard K. 1989. "Living on Borderlines: Man, Poststructuralism and War." Pp. 259-321 in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edited by 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 Shapiro.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 Bartelson, Jens. 1995.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Bauman, Zigmunt. 1989.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endix, Reinhard. 1964.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och, Marc. 1953.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Boli, John, and George M. Thomas. 1997. "World Culture in the World Polity: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171-190.
- Boli, John, and George M. Thomas. (eds.). 1999.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8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1993. *The Logic of Anarc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allahan, William A. 2006.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Resistance in Pacific Asia*. London: Routledge.
- Collins, Randall. 1986. *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 University Press.
- Cox, Robert W. 1986.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edited by Robert O. Keoha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illon, Michael G., and Andrew Neal (eds.). 2008. *Foucault on Politics, Security and War*. London: Palgrave.
- Eisenstadt, S. N. 1966.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Foucault, Michel.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 Foucault, Michel. 1991. "Governmentality." Pp. 87-104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ited by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ichel.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Foucault, Michel.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Frank, Andre Gunder. 1996.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London: Routledge.
- Giddens, Anthony.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Oxford: Pol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ng, Gerrit W. 2001. *Memory and Histor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ssues of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Gorski, Philip S. 2003. *The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Calv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rski, Philip S. 2010. "Beyond the Tilly Thesis: How States Didn't Make War, and War Didn't Make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VII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Sociology on the Move, Gothenburg, Sweden.
- Halliday, Fred. 2002. "For a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ld, David. 1990.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 State." in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Hobden, Stephen. 199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London: Routledge.
- Hobden, Stephen, and John M. Hobson (eds.). 2002.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bson, John M. 2000.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bson, John M. 2002. "What's at Stake in 'Bringing Historical Sociology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cending 'Chronofetishism' and 'Tempocentr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41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Joas, Hans. 2003. *War and Modernity*. Malden, MA: Blackwell.
- Lawrence, Philip K. 1997. *Modernity and War: the Creed of Absolute Viol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Linklater, Andrew. 1998.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Cambridge: Polity.
- Mann, 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n, Michael. 1988.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Mann, Michael. 19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John W. 1987. "The World Polity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Nation-State." Pp. 41-70 i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Constituting Stat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edited by George M. Thomas, John W. Meyer, Francisco O. Ramirez, and John Boli. Newbury Park, CA: Sage.
- Meyer, John W.,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1997.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44-181.
- Moore, Barrington. 1967.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 Morgenthau, Hans Joachim. 2006[194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 Nye, Joseph S. Jr.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 Ohmae, Kenichi. 1995.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 Polanyi, Karl. 1944[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Reus-Smit, Christian. 1999.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isse-Kappen, Thomas. 1995.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nderson, Stephen K. 1988. "The Neo-Weberian 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Balance Sheet." *Sociological Forum* 3:307-314.
- Sassen, Saskia. 1996. *Losing Contro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apiro, Michael J. 2004. *Methods and Nations: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the Indigenous Subject*. New York: Routledge.
- Shaw, Martin. 1991. *Post-military Society: Militarism, Demilitarization and War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haw, Martin. 2000.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Globality as an Unfinished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lair, Leslie. 1995.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84.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Pp. 3-43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 Current Research*, edited by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nthony. 1983. "Nationalism and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4:19-38.
- Smith, Steve. 2002.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223-243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Stephen Hobden and John M. Hob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E. P. 1966.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Tilly, Charles (ed.). 1975.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 Tilly, Charles (ed.).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Tilly, Charles (ed.). 1985.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ed.).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 Vandersluis, Sarah Owen. 2000. *The Stat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Walker, Rob. 1993. *Inside/ Outs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ltz, Kenneth Neal.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Weber, Cynthia. 1995. *Simulating Sovereignty: Intervention, the State and Symbolic Exchange*.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Weber, Max. 1946.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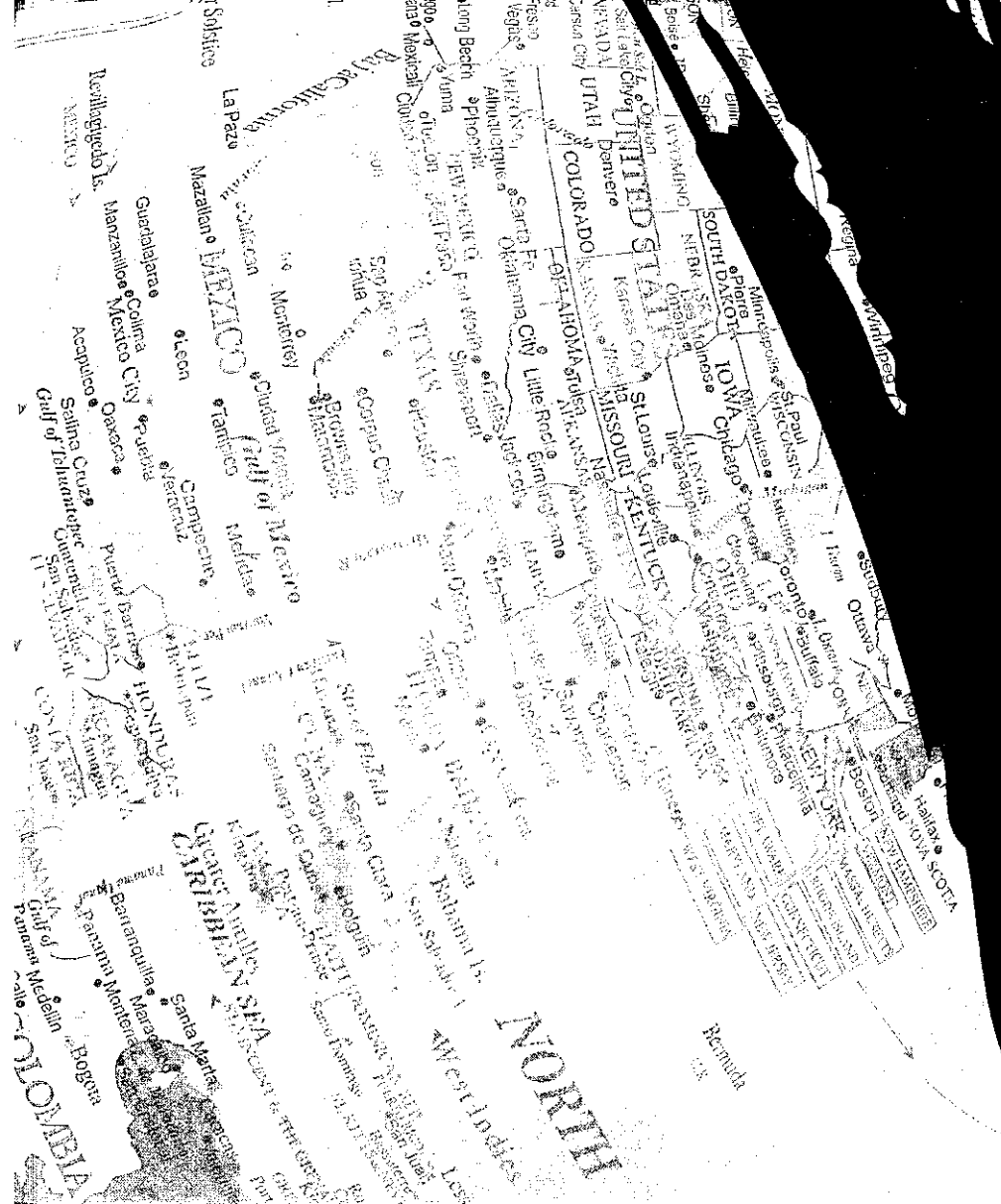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earley, Steven. 1996. *Sociology, Environmentalism, Globalization: Reinventing the Globe*. London: Sage.

# 國際關係理論

包宗和 主編

蔡政文、明居正、包宗和、鄭端耀  
曾國祥、徐斯勤、宋學文、林炫向  
陳牧民、莫大華、黃競眉、汪宏倫  
洪鏗德、姜家雄、石之瑜、袁易  
吳玉山、林碧焰、朱雲漢、曹俊漢

合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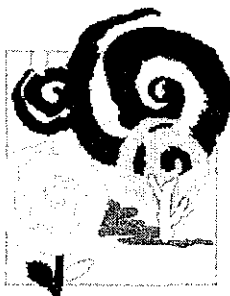
國際關係理論 / 蔡政文等著；包宗和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五南，2011.01  
面；公分

ISBN 978-957-11-6130-3 (平裝)

1. 國際關係理論

578.01

99020447



1PU9

## 國際關係理論

主 編 — 包宗和 (444)

作 者 — 蔡政文 明居正 包宗和 鄭端耀 曾國祥  
徐斯勤 宋學文 林炫向 陳牧民 莫大華  
黃競涓 汪宏倫 洪謙德 姜家雄 石之瑜  
袁 易 吳玉山 林碧炤 朱雲漢 曹俊漢

發行人 — 楊榮川

總編輯 — 龐君豪

主 編 — 劉靜芬 林振煌

責任編輯 — 李奇蓉

封面設計 — P.Design視覺企劃

出版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11年1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580元